

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好似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叙述他的生涯的人所说的：“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底标记。”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

——罗曼·罗兰《贝多芬传》

1 晚春的江南，风景秀丽……

1949 年的此刻，顾准却无心欣赏这迷人的景色。他有太多的事要做，解放上海的战役即将打响，如何接管大上海，是他彻夜思考的问题。

1949 年，无论对中国历史抑或是对顾准本人，都是非同寻常的转折之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 28 年的浴血奋斗，终于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顾准自 1931 年投身革命生涯，从白区到解放区，辗转千里，艰苦卓绝，他将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的首任财税行政长官——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话还得从 1949 年二三月份说起。此时，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已经开始研究如何接收这这座远大特大城市上海，开始遴选各方干部，顾准因其革命业绩和资历，自然名列其中。

3 月 5 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开幕。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顾准听了这个报告的传达，对其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论断，深有感慨。

二中全会闭会的次日，中央召开了安排人事的座谈会。邓小平受中央委托，提出经过酝酿的华东局（包括上海）的人事安排。

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赓、刘晓、刘长胜、曾镜冰、舒同等 17 人为委员。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中共上海市委：由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为委员，饶漱石为书记。

上海市政府：市长陈毅，副市长为曾山、潘汉年及一位非党人士(后为盛丕华)。

华东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陈毅、粟裕，政委邓小平、饶漱石、谭震林。

根据华东局在渡江战役前制定的接收上海市的总体布署，原华东财委准备接收上海的全部财经系统。当时做了如下安排：华东财委主任曾山则南下。顾准也随之南下，其原任的财政厅长职务移交给老战友周光春（原山东粮食局长，“文革”后曾任国务院上海经济区办公室副主任）。于是，顾准参加到南下准备工作的行列中去了。

南下准备，就是集中南下干部学习党的城市政策，了解应该接收的单位，初步考虑接收的方案等等。南下干部队伍的集中完成于当年 2 月底前后，由原华东财委所属的财办机关、财政厅、银行、工商总

局、生产部等及其下设各机构和山东军区后勤部抽调了 3000 人左右，分为财政、银行、商业、外贸、重工业、轻工业、交通、公用事业、房地产、劳动工资、农林等十余个大队，合并组成“青州总队”[①]。这支队伍实际上就是将要接管上海市财政经济系统的精英，顾准被任命为青州总队总队长，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被编在第八大队，专门接管上海市的公用事业部门。

浩浩荡荡的南下接收队伍，在顾准的率领下，有条不紊地从青州出发，由津浦铁路乘车南下，首先驻安徽蚌埠以西的怀远县，进行政策学习和接收准备工作。顾准率部南下途中，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带，他那两铅皮箱的心爱的书却非带不可。

其时，顾准的夫人汪璧很想和丈夫一路南下，但是，顾准考虑到他们刚添了次子顾南九（即高粱），便安排汪璧与家人，随同家属队伍稍迟一些南下。

怀远位于淮河和涡河交叉口，是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鱼米之乡。同时这里也是新四军与武装自卫委员会的老根据地。青州总队在当地驻军接应下，分别住宿在县城与附近农村。

这时各地来怀远集合的财经接管干部，人数已达 3500 多人。顾准安排大家分成九个单位学习。主要学习文件有：《入城纪律守则》；上海地下党转来的情报与地方常识；华东局政策研究室编写的《接管城市工作学习提纲》、《新区工作学习提纲》、《城市政策》 华东局前方工作委员会编发的外国传媒介绍国际形势的电讯等等。怀远集训学习时，接管干部都很兴奋，七嘴八舌地表达意见，曾山经常让顾准作概括性发言。顾准很讲民主，新剃了一个安徽“笆笆头”的顾准，坐在一张农家粗木方桌前，总是笑呵呵地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然后进行归纳。他有超群的概括能力，每次都能用逻辑性很强的语言，充分反映争论焦

①《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13 页。

点和各方论据……他很快就能够赢得大家的尊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怀远集训进行得轻松热烈，各个学习点经常传出一阵又一阵欢声笑语。当地革命群众争先恐后地推车挑担，给青州总队送来肥猪、鲜鱼和绿油油的新鲜蔬菜，尽量让大家在进军大上海前吃得好，养得壮……老百姓对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期待与支持，深深地感染了顾准。

4 月初，在总前委的指挥下，二野、三野的渡江部队已在长江北岸集结完毕。华东局决定，青州总队于 4 月 3 日起，从怀远分四路出发，经苏北宝应等地，宿营于靠近长江北岸的扬州，随时待命随大军渡江。渡江后，接管大上海的各路文武俊杰，将在长江对岸的丹阳会合。

2

丹阳位于镇江以南约 50 华里处，其战略位置特别重要。由此向东 500 华里，是蒋介石尚在固守的大上海。它的西面，是刚刚解放的南京。而它的南面，就是茅山根据地和顾准当过专员的东路根据地。这里物产丰富，水陆交通极其便捷……解放与接管大上海的部队，选择这样一个依山傍水、条件良好的军事要冲作为大会师地点，确是无可挑剔的。

顾准环视着丹阳的景色，感到异常亲切：一晃眼，离开老家已经九年了！

丹阳，并不是一座大城市。然而， 1949 年四五月间这座小城突然热闹非凡。成千的干部从解放区、从北平、香港等地日夜兼程地赶来，一下子变得人多了，拥挤了，忙碌了。来的人，有各纵队穿军装的，也有来自上海穿长衫西装的，真是人来人往，好不热闹[①]。其中不少人与顾准都相熟，在街上巧遇，便都紧紧拉着手，笑呵呵地说个不停。由

①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8月版，第 622页。

于接管上海的各路干部都在丹阳县城集合，一时房屋显得十分紧张。青州总队的三千多名干部，便背着背包，分别住进了学校、祠堂、寺庙和临时草棚。他们摊开稻草当床铺，搁起门板当桌子，一会儿就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

在丹阳，华东局具体决定了接管组织和人事安排，分政务、军事、财经、文教等四个方面编组，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的建制是：主任曾山，秘书长骆耕漠。财政处处长顾准，副处长陈智方、王良。贸易处处长徐雪寒；金融处处长陈穆；工商处处长石英；劳工处处长马纯古；轻工业处处长刘少文；重工业处处长孙冶方；农林处处长何康，副处长李人凤；公用事业处处长叶进明，副处长程万里。

邓小平亲自和陈毅、曾山一起审定了上海财经接管委员会的名单。邓小平将这个机构称为“人才荟萃之地”。陈毅则开玩笑说，这些精选的财经领导干部“统统都是人精”。

顾准被任命为上海市财经接管委员会财政处处长。他负责的财政处，将要接管的范围很大，包括八个重要部门：即上海市财政局、财政部上海货物税局、财政部上海直接税局、上海市地政局（相当于土地管理局）、财政部驻沪办事处、财政部公债司驻沪办事处、 上海市会计处、上海市审计处等。

顾准在丹阳的一个月左右时间中，除了组织学习接管工作的有关政策外，还学习了上海地下党收集汇报的《上海概况》（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情况），让大家对接管单位的情况、特点以及接管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做到心中有数。此外，总队党委还组织部分人员到无锡学习接管财政税务机关的工作经验。

5 月 12 日和 13 日两天两夜，陈毅听取了青州总队关于财经接管工作的规划和干部学习、人员配备以及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并指示，在接管城市后,在运输供应方面必须迅速调集‘ 两白一黑 ’(指米、棉、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等急需物资，以利城市恢复生产和保障军民供给。

当时，许多干部都不敢在这样高层次的会议上随便发言。顾准在上海生活工作过多年，是典型的“老上海”。他在讨论会上惹人瞩目地唱了好几次主角，陈毅不断鼓励他充分发挥。顾准那时神采飞扬、口若悬河地精彩发言，譬如，如何恢复工商业生产贸易，如何与各界民主人士联系，如何征收税款、繁荣新上海……至今仍为健在的与会者们津津乐道。他的许多建议，都被华东局及时采纳了。陈毅高兴地夸奖道：“顾准确有‘倚马可待’之才。足见平日的积累！”

5月10日清早，陈毅在大王庙院内召集干部作入城纪律报告。陈毅作报告开门见山：

> 今天主要讲的是入城纪律和在上海要注意的事情。大家都已经学习研究过接管江南三个文件，有的也测验了，但今天还要讲讲。在丹阳会合后，我们入城的纪律并不好，这样到上海后并无把握，所以重新讲讲[①]。

陈毅还生动有趣地讲到上海的接管工作：上海的工人有革命传统，上海有地下党，有各阶层民主人士。大批民主人士到北平，我们还要欢迎他们去上海。我们欢迎他们就是要他们帮助我们搞好上海的接管工作。我们请他们吃饭、坐车，将来他们仍要纳粮上税，要请我们大吃，我们一本万利。有他们配合我们，帮助我们，加上我们自己努力，上海没有搞不好的。没有这点信心，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革命几十年，小小上海还搞不好吗？陈毅在讲话中侃侃而谈，深深打动了顾准等许多人。

① 见《陈毅同志在丹阳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4期。

5月21日，总前委在丹阳发出向上海总攻的命令，历时15天的上海战役终于打响了。

5月24日，三野前沿部队突击进入上海市区。

5月25日晚11时至26日凌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干部，陆续到达上海。这时，除苏州河以北的闸北、杨树浦、江湾、大场、吴淞一带还有零星枪声，沪南的游行队伍却已经涌上街头，和入城的解放军一起高唱《团结就是力量》了。

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上海战役的胜利，意义重大而深远。正如1949年5月29日新华社社论《庆祝上海解放》(由胡乔术代拟)所指出的：

> 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欢呼。这是因为，第一，上海是中国的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打倒了自己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第二，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上海的解放表示中国人民已经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这两种情况，使得上海的解放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上海是一个世界性的城市，所以上海的解放不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而且是国际和平民主阵营的世界性的胜利。①

3 1949年5月26日凌晨，顾准一行人由上海西北郊进入市中心区，驻在南京路上金门大饭店。大部分人员就地而卧，以大饼充饥。

①见《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85—387页

顾准到上海后迅速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在上海原国民党税务机关工作的地下党员陈新华，满怀喜悦地来到金门大饭店，与顾准会晤。

根据陈新华事后的回忆：顾准在一间不太宽敞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他们。顾准看上去年龄约四十开外、瘦长个子，身着一套半新的草绿色布军装，一张因长期操劳而显得苍白的长方脸上依然显露出军人的刚毅。顾准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浑色的宽边眼镜，那对深藏在黑眉下的眼睛透射出炯炯光芒，使人感到既朴实又亲切。

陈新华等人汇报了地下党在税务局与敌斗争的情况。顾准听完以后，“唰”地一下站起身来，挺起胸脯，向他们庄严地行了个军礼。

他高兴地说：“你们只有四个年轻的党员，在两个税务局内艰苦工作，使税务局全部财产、档案得以完好地保存，你们立了大功。我代表军管会感谢你们，并向你们致敬！

陈新华等人接着又向他汇报说：“旧机关工作人员对‘接管’思想顾虑很重。过去国民党的新局长上任总带着自己的亲信班底来，不会拍马奉承的人，往往就被裁减或调离。这次共产党的局长来了，大家都怕保不住饭碗……”

顾准听了，脸色严峻得像一片青石，他坚定地说：

“请你们告诉群众，人民政府的税务局长不是反动派的贪官污吏。我这个接管大员是党要我为人民当家理财的。我们靠的是大家，我们都是人民的公仆。只要是一心为人民的，我们不但不‘裁退’，反而要依靠和欢迎。”

“人民的公仆”，这声音余音缭绕，陈新华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了这如此亲切的话语，都觉得十分振奋。当陈新华等人回去，把新局长顾准要当人民的公仆的话，原原本本传达给广大职工时，那些在旧社会看到局长就战战兢兢的小职员都激动万分，不仅顾虑冰释，更萌生

了全心全意帮共产党做好工作的想法。

接管财政局，是上海整个接管工作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事情。5 月 27 日那天，顾准身穿崭新的细布军装，足登青布鞋，率领朱如言（接管后担任上海财政局副局长兼税务局副局长）、谢祝珂（接管后担任地政局副局长）、蔡兆鹏、彭斌、谢胥浦等接管干部，在武装护卫下来到财政局。财政局地下党纠察队长王伟鼎代表地下党组织向顾准等人表示热烈欢迎，并将顾准引人豪华的局长室。

顾准在局长办公桌前坐定后，地下党支部书记程子嘉，便传唤早已静候在一旁的国民党财政局局长汪维恒，以及主要官员张兴国、俞忠栋等依次上前，按规定移交权力。

这时，汪维恒突然要求和顾准单独谈一会儿，顾准沉吟了片刻，同意了他的要求。汪维恒避开了众人后，才悄悄告诉顾准，他其实是共产党潜伏在沪的情报干部。解放前夕，由台湾赶来上海，在秘密策反国民党上海市市长陈良时，反被陈良委任为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上海银行董事长。

汪维恒告诉顾准，他对解放军来财政局接管，早已做好了各项必要的配合与准备工作，只等接管干部上门。而且，他还有台湾军事设施和美军顾问团的绝密情报，要立即呈送潘汉年本人。但是，他已经好几个月找不到暂离上海的潘汉年了。

顾准莞尔一笑，潘汉年正是昨天才和大家一起从丹阳回到上海的。顾准弄清情况后，便在他办理完交接手续后，将汪维恒所言转报上海市委。不久，经中央社会部批准，汪维恒的身份解密。他随即被任命为上海市地政局局长。从此以后，汪维恒成为顾准的亲密同事。

在短短的时间里，将上海的财政、税务、地政、审计等大权，顺利地交到人民的手中。顾准郑重宣布，旧税务机构的所有职员，除少数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外，一律留用。

5 月 28 日上午，上海市各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大搬家。华东财委搬到顾准解放前当过行员的中国银行。顾准的财政接管处搬到滇池路 74 号四楼。华东局则从西区的圣约翰大学，搬到市中心的三井花园（今瑞金宾馆）。

三井花园原是国民党的高级俱乐部，园内古木参天，一幢幢欧式别墅坐落在宽广的草坪上。陈毅刚在三井花园落脚，便召开军管会处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当天下午接管上海市政府的大问题。陈毅要顾准等各位新局长，都出席他的就职演讲。陈毅并开列了一张单子，具体指示各位“大员”，今后如何支持他这个当市长的“父母官”。

当时的旧上海市政府坐落在江西中路、汉口路转弯口。这是一幢典型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科林斯希腊式花岗岩环形建筑，最初是工部局大楼，后来成为国民党市政府。楼内公共地面和墙壁采用华贵的大理石，处处装饰都十分考究。

28 日下午，风和日丽，大楼顶端红旗招展，楼房内外清洗一新。近旁的黄浦江在蓝天白云映照下显得格外明丽。当海关的大钟敲响两声的时候，陈毅率领军管会所属军事、政治、财经、文教各接管委员会的主要干部，包括顾准在内一行人气宇轩昂地走上了市府大厦的黑色大理石阶梯，正式接管市政府。

嘹亮的歌声回荡在市府大厦的苍穹，楼顶上飘扬着鲜艳的红绸大旗。

国民党上海代理市长赵祖康交出了旧市府关防印信。随后，陈毅又对旧市政府所属人员讲话。他希望大家各尽职守、办理移交，并听候人民政府量才录用。

当天，崭新的“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大门牌挂了出去，标志着人民政权的正式诞生。

不久，顾准带着满面笑容，拿着与陈毅市长商定的恢复经济方案

走进市府大楼，精神抖擞地正式出任新上海财政局局长。

4 1949年5月29日，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街头上的显要之处张贴出由陈毅、粟裕签署发布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字第一号布告，明确地宣告：现上海已获解放，原国民党各项税务机关业由本会经管，一切财政收入均转为为人民服务，性质上已与过去完全不同。争取全国胜利，责任至重，值此解放伊始，原有各项国税市税，仍暂继续征收，希各界人民照旧缴纳，勿得逃避。至于国民党原订税率不合理之处，俟秩序安定，本会即根据发展生产之原则，修订新办法实施。

这一布告的起草者即为顾准，他考虑到财税机关接管以后，为了整顿旧税制，对原由国民党政府规定的属于勒索摊派的保卫团费、保安特捐、新兵安家费等6种税捐，即行明令废除。

对于财政税收政策，既要照顾政府的开支，首先是军费开支，藉以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前线，同时又要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据此，市人民政府采取先简单，后繁复；先沿用，后改并的步骤，在对旧税制做了初步攻造以后，陆续颁布了货物税、营业税、印花税等9种地方性税种的暂行实施办法。

顾准说：“上海是全国轻工业也是私营工业最集中的城市，上海税收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比重很大，税收工作应该是上海财政工作中突出的重点。我军进城后的第一张布告说得是在税制未曾改革以前，一切税收一律暂照国民党统治的税法照旧交纳，目的就是充裕深入，保证供应。”①

历史历经沧桑，有些事情不可再现，好在我们有一份顾准遗文，对

①《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44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当时上海财税接管以后，如何开展工作有所披露：

由于连年战祸，解放前夕上海工业已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80%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

因此，上海市的地方财政收入较少，1949年5月至12月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只有697万元，而抢修道路桥梁、恢复生产、安置人员、保障人民生活、疏散救济难民等各方面的支出较多。经过各方努力，随着生产的逐步恢复，收入的增加，在上海解放初期，只有六七两个月是收不抵支，到8月份收支平衡。10月开始建立全市的经费概算，经市人民政府行政会议通过后执行，并委托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代理市金库。所有这些，都与顾准的努力分不开的。

据当时在华东局工作与顾准有过接触的一位老同志回顾：

> 他（指顾准）是老革命。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很多，但他这个同志有一个特点，就是骨头硬。顾准同志在上海刚解放时任上海第一任财政局局长。那个时候我在上海，我那时年龄很小。但我有特殊的地位，就是在华东局工作。当时在上海街上，经常贴有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顾准、上海市税务局局长顾准的布告。在那时顾准同志的名字给我很深印象。但见他本人的面不多，只是他到华东局开会（顾准另任华东局财政部副部长职），我在华东局办公厅做会务工作能看见他。①

除了是“出布告最多的局长”的戏称之外，顾准以“地价税”巧妙回收“跑马厅”等外国资本家的常年占地之事，至今仍是国际税务

①原载《顾准史学思想沙龙》打印稿，第4页，由顾准的女婿张南同志提供。

界的美谈。上海财、税局的老职员，如今提起顾准，仍充满尊敬：“顾准局长‘来事’（沪语‘能干’之谓）。全国沿用至今的财税专管员制度，就是他亲自创建的。大老板、小摊贩，谁敢在顾准手里逃税？当时，上海苦苦支撑着中央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坐天下，顾准确实功不可没。”[①]

这里可以追述一下顾准怎样巧妙地利用“地价税”（即房地产税）与外商斗争的故事。他于1949年10月间突发异想，建议地政局局长汪维恒和他联手，以地价税回收跑马厅等大批外国建筑及其占地。顾准的依据是，上海开埠后，外国列强于1845年强加给中国《上海土地章程》、1854年单方面制定《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均早已作废。可是，汪精卫于1943年依靠日本，向英、美、法收回租界时，却无法解决大量遗留问题。战后，国民党虽然对租界的外国建筑开征地价税，但畏于欧美帝国主义淫威，制定税额既低，又经常减免，也使中国继续吃大亏……现在，新上海的税务、财政、地政三局，完全可以联合行动，对租界黄金地段上的外国建筑，按新拟标准征收地价税。

汪维恒极力支持顾准这一独创性的想法。市委研究顾准的报告后，也立即复文批准。

于是，由顾准牵头，上海便大张旗鼓地对大批外国著名建筑开征地价税。这些建筑，昔日多是灯红酒绿的场所，解放后陷入难以经营的窘境。没过多久，外国老板都无法按新规定交纳黄金地段的地价税和滞纳金。与此同时，顾准依照西方会计界以“应收应付”纳税惯例而制定的《税务概要》，又让税务局查实了这些外商的所得税欠交款。俗话说，法令如山。顾准利剑在手，便依法将各种催交税款的通知，像十二道金牌连连发出。那些曾经巧取豪夺租界地皮的外国产权人，一面咬牙切齿地咒骂顾准是“敲骨吸髓”的“税务魔鬼”，一方面宁愿将

①高建国：《拆下肋骨当火把——记已故经济理论家顾准》，1998年3月27日《新民晚报》

大批豪华建筑拱手相送，以抵消拖欠上海市政府的各种税金。英国内阁接到驻沪商人的告急报告，曾专门开会研究对策，却无计可施，只好老老实实地表态：“对此，我们也没有办法。”一段时间内，欠税的各国外商，纷纷委托上海地政局专门成立中华企业公司，代办房产抵消税金的法定手续，简直热闹非凡。

据顾准在自述中回顾和其弟陈敏之的补充，顾准在征收地价税时，为了做到万无一失，还调阅了大量陈旧的“道契”，参考了抗战胜利后的“中美善后条例”等外交文件，并通过外交部的陈家康司长（后为副部长），取得“部印周批”特批件，即文件上盖有外交部大印，又有周恩来总理亲笔签字。因此，当顾准铁面无私地把十二道金牌一一发出后，驻沪外商统统无话可说。

顾准翻阅着一大叠依法办理的外商房产权收归国有登记表，大笑着说道：

“这个案，可是永远翻不过来的啊！”

顾准以这种巧妙方式回收的主要建筑有：跑马厅（今人民广场）、跑狗场（今文化广场）、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馆）、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法国总会（今锦江俱乐部）、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其范围之广，足令后人惊叹不已。

顾准曾说过：“应该承认，上海税收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虽然探本溯源，在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比威力面前，南京的美帝‘紫石英号’差一点被我军俘获，长江和黄浦江上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军舰，他们的侵华经济势力是只好滚蛋的。然而，税收工作至少做到了一件事：我们‘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我们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①

①《顾准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72页。

由于政策方法正确，顾准在上海税务系统工作的前期，即旗开得胜。1949 年 6 月至 8 月，可观的入库税金，不仅为市政府缓解了资金困难，也部分抑制了通货膨胀。

5 现在回过头来，叙述一下顾准与潘序伦之间的师生之谊。

顾准早年因为家庭无力继续承担学费， 12 岁时在中华职校初中毕业后，就不得不停止学业，进入由潘序伦主持的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

从 1927 年至 1940 年顾准秘密参加新四军，在这漫长的 14 个年头中，除少数时间外，顾准一直在立信工作，与潘序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顾准聪颖好学、勤奋努力，很快从一个练习生成长为一个会计学者、著作家、教授、会计师，成为立信的台柱之一。他前后担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函授部主任、夜校部主任、立信会计高级职业补习学校教师、事务所稽核员、编译科副主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教授等职，并以此为职业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潘序伦在其晚年（时在 1983 年）还念念不忘，他说：

> 顾准同志在我国现代会计界中，可称为一个难得的人才。他天资聪颖、才华出众，早在 1927 年就参加了我所创办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做一名练习生，当时只有十二三岁。他经过刻苦勤奋自学，掌握了会计这门科学，便在所编辑部工作和主编第一卷《立信会计季刊》四期（由立信同学会主办）。由于他讲解透彻，说理清楚，深得同学们的欢迎和爱戴。 1935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编著的《银行会计》，列为《大学丛书》，

他也开始登上大学的讲坛。以后又陆续写了不少有关会计的著作和论文，如与我合著的《中国政府会计制度》、《会计名词汇译》（中英文对照）等，均有他独特的见解和大胆的探索，深为社会所称许和赞誉，我亦有所倚赖焉。①

就在上海解放前夕，1949 年 4 月，驻扎在丹阳的三野司令部通知顾准写一封信给潘序伦，劝他留在上海等待解放，不要亡命港澳台，并由华东联络部派人去上海将信递给潘。

潘序伦本人也十分明智。他知道，立信会计事业的根基在大陆，离开了，到哪里去发展呢？但是，潘氏毅然留了下来，与顾准的来信也有直接关系。据潘序伦回忆说：“我曾一再提到和我一起工作了 20 年的顾准同志，上海解放时，他跟随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一回到上海，就来我家看我，并带来潘副市长的名片，代表他向我问候。潘汉年同志原是我原籍江苏宜兴县的远房族侄，他称呼我为‘四叔’。上海解放后，顾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兼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和直接税局局长，是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在财经方面的一位得力助手。他来我家劝我在上海市人民政府下担任一个职务，为国家为人民效力。但我因前半生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影响较深，一时尚难解脱，就对顾准说：‘我以一个“再蘸妇”的身份（指我已失足担任过国民党蒋政权下的高级官吏），来担任人民政府的公职，必将使我十分为难。因为在必须表态的场合，用进步的口吻来发言，有许多和我同样处境的人们会骂我为投机分子，无耻之徒；用落后的口吻来表态，又担心要为自己招致不良后果。因此，还是先让我闭门思过，等一段时期再说罢！’我就这样自视清高，不问政治，回绝了他的好意……我虽没有出来为党工作，但还是关心我国的会计事业，鼓励和推荐介

①参见《潘序伦回忆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6年9月版。

绍了不少旧同事和学生，到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任职。”[①]潘序伦对自己培养的学生顾准能够为新中国服务，感到十分自豪。并有意让顾准出任立信会计补习学校的校长或校董，以作为自己事业上的接班人，因囿于工作纪律不允许，顾准只能婉拒。

得知顾准从解放区回到上海，立信校友也都十分兴奋，还专门举行了欢迎仪式。据立信老校友回忆说：“1949 年，上海庆祝解放，顾准同志随大军返沪主持上海市财税工作。我们全体在沪校友假座天津路银业公会欢迎他，我兴奋得没法形容。他还是那个瘦长个子，穿一套不甚合身的黄土布军服，桌上放着一只大公事包、一罐香烟，说话极其谦和诚恳。”[②]

会后，顾准基于当时城市接管和财经建设的需要，介绍了大批立信校友参加革命工作。如现居南京的温以仁校友，尽管事隔多年，仍然非常怀念当年情景，他回忆说，“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全市所有私营银行均告停业，我又第二次遭受失业的威胁，不得已再次向母校求援，在潘老师的亲切关怀下，通过顾准老师介绍，让我到无锡苏南行政公署工商局参加革命。从此我作为革命阵营内的一个会计专业干部，在江苏省商业系统工作了 40 多年，直至现在。”

顾准重返上海后，不仅对潘序伦十分关心，而且对立信事业其他负责人诸如李鸿寿、陈文麟、顾淘等也倍加关爱。在顾准诞辰 80 周年之际，李鸿寿(1909—1998，民主人士，曾任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后任上海财大副校长）接受采访时深情地说：“1949 年 5 月底，顾准同志打来电话，说他随军进入上海，住在金门酒店，不久就要到财政局办事。同时称赞我留在上海继续搞教育和会计工作，做得对，这两样在新中国都很重要。隔了几天，我到江西路财政局拜会顾准局长。他在

①参见《潘序伦回忆录》。
②严松龄《读纪念顾准文章有感》，1995年9月25 日《立信校友通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